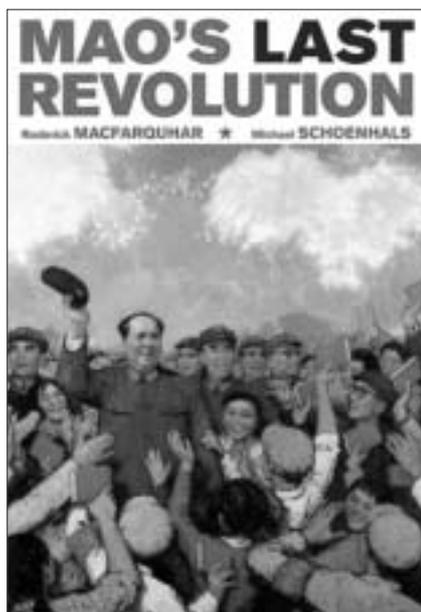


西方「文革」研究新力作 ——評《毛澤東的最後革命》

● 鍾延麟

馬若德與其學生沈邁克在文化大革命爆發四十周年之際推出《毛澤東的最後革命》一書，立刻引起各方的矚目。因為馬若德的成名作正是極負盛名的三冊《文化大革命的起源》，馬氏等對於文革本身的研究所得和所持看法，自然為學界拭目以待。



Roderick MacFarquhar and Michael Schoenhals, *Mao's Last Revolution*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眾所周知，馬若德 (Roderick MacFarquhar) 是西方首屈一指的中共黨史研究專家，其長期以來的研究成果未因時間的流逝而褪色，反而在經歷光陰的考驗後，進一步突

顯出其當時雖受制於層層「竹幕」(bamboo curtain)，但仍能出色地掌握中共高層政治發展之梗要脈絡。馬氏的著作經廣泛的流傳而具極大的影響力，在西方中國研究學界中成為認識中共建政後歷史發展的必讀經典。鑒於其位居相關領域的先鋒性地位，後進的研究無論欲深化鑽研或提出另見，多以之為參照、對話的對象。尤有甚者，中共元老在白首回顧崢嶸歲月時，例如甫於2007年初離世的薄一波，也曾特別針對馬氏的論點有所回應^①。這也反映出其著作所受到的重視程度。

馬若德與其學生、亦是一名出色的中共黨史研究學者沈邁克 (Michael Schoenhals) 合作，在文化大革命爆發四十周年之際推出《毛澤東的最後革命》(*Mao's Last Revolution*) (引用只註頁碼) 一書，立刻引起各方的矚目。因為馬若德的成名作，正是對文革追本溯源，所寫就的極負盛名的三冊《文化大革命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②。有了先前對文革發生背景抽絲剝繭的基礎，馬

氏等對於文革本身的研究所得和所持看法，自然為學界拭目以待。在距離《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三冊出版近十年之後，本書的面世猶如「千呼萬喚始出來」，公告作者對這場「史無前例」的政治運動的剖析與心得。筆者將之引介給中文讀者，以增進對西方文革研究以至中共歷史研究現狀的認識，也應具有一定的學術意義。

綜觀本書主要有四方面的特色：一、對文革主事者涉入運動與所負責任的直言不諱；二、對文革作不限單一層次、面向的介紹；三、對文革相關事件中存有爭論、歧異部分之平衡處理；四、使用資料的豐沛與多元。

一 對文革主事者的評論

關於文革的相關評價，尤其當時中共主要領導人在其中的責任問題，中共官方有一制式的標準答案，其依據就是〈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其中最敏感的部分無疑是文革的始作俑者、黨主席毛澤東在運動中的作為。〈決議〉中雖明指文革是毛澤東「發動和領導」，但是又淡化其所應負的責任。除強調兩個「反革命集團」[「背着」他進行了大量禍國殃民的罪惡活動]外，甚至部分歸咎於黨內階級鬥爭的思想慣性和傳統封建專制主義的餘毒。作者在本書中至少在三處表示，希望中國未來的歷史學者有更大的自由，去研究和著述與文革相關的歷史事件與關鍵人

物(開卷獻辭、頁xii、462)。作者本身就不受此一中共官方解釋框架的制約，在「數風流人物」時得以暢所欲言。

對於毛澤東，作者首先指出毛在意識形態上對修正主義蔓延帶來危險的迷思，以及在權力分配上對實權人物貳心反撲的疑懼(頁7、10-11)，以致他決定不循常規，不顛覆整個政治體制與現狀不罷休。其次，有關「一小撮」「壞人」從中作梗、蒙蔽聖上，致出現「長安不見使人愁」的說法，作者一方面明白點出毛在資訊來源無虞下任意擇取、拼湊符合其意的圖像；另一方面，作者取法其他學者研究德國納粹希特勒、赤柬波帕(Pol Pot)時，形容下屬竭盡所能探測最高領導人諱莫如深的態度所提出的“working toward”概念(頁496，註70)。這種近乎中文「揣摩上意」的行為模式，在文革中乃導因於毛澤東刻意地隱蔽自我。作者強調毛本身為了佯裝欺敵、出其不意(劉少奇、鄧小平在文革初派工作組上犯錯誤，就是處於「我明毛暗」的情況)，或見機而作、掌握至高點而表現出模稜兩可的意向，正是所謂「激進派」(radicals)盡其所能地爭求毛認可、「寧左勿右」的根本動力(頁48)。

再次，作者逐一駁斥了諸多試圖為毛開脫的流行說法，突顯毛在相關事情中負有無從迴避的責任。例如：陶鑄倒台，毛澤東不是被動追認，而是與之脫不了關係(頁189-90)。至於「武裝左派」問題，中共史家多怪罪江青，然毛澤東責不可卸(頁215)。雖然是毛澤東自己點出

作者不受中共官方解釋框架的制約，指出毛在意識形態上對修正主義蔓延帶來危險的迷思，以及在權力分配上對實權人物貳心反撲的疑懼，以致他決定不循常規，不顛覆整個政治體制與現狀不罷休。

本書以較寬廣的學術社群和一般讀者作為閱讀對象，對文革探討的面向也盡可能地伸展，亦即力求「廣而全」，使之既非同於僅鎖定高層人事傾軋的傳統文革著作，也與馬若德自身先前獨立著作的聚焦視野有所不同。

「四人幫」結夥組派的問題(頁397)，但事實上，毛是重提輕放，根本無將之「逐出師門」之意。對於1976年春「天安門事件」最終以強制的方式落幕，毛澤東並未因病入膏肓而不知事態實情和相關決策，因為毛在事發後強調要維持鄧小平的黨籍以觀後效，正是其意識清楚的明證(頁429-30)。

再其次，對於毛澤東在文革期間政治謀略的老練、甚至險詐，作者明確指出：中共官方史家可以接受將毛描述為偉大的戰略家，卻在晚年不慎走火入魔，但不會同意將他形容為一個詭計多端的幫派首領(頁326)。然而，作者就認為，1967年「二月逆流」的起因與導致毛、林關係急轉直下的1970年廬山會議，毛懷有「引蛇出洞」、釣魚上鉤的心機(頁332)。說謊更僅是其許多用策之一。

此外，作者透過平白的事實陳述，刻畫出周恩來晚年在文革中扮演的雙重角色：一是充斥於現今中共官方論調、無須贅述的偉岸形象，也就是戮力使黨國在「大亂」中

仍可維持基本的運轉；另一則是只有在境外研究才能見到的冰冷如霜的酷吏面孔，亦即如忠僕般對毛澤東自詡的「第二偉業」，不遺餘力地貫徹、亦步亦趨地實踐。

有關林彪「悲劇」的發生，作者指出林縱使主觀上不欲爭雄，但客觀上，因軍隊在文革中出面恢復秩序與動員備戰而順勢坐大，不憑其意志轉移地，林彪成為毛澤東腦海中軍人主政陰影在現實中對號入座的具體化身(頁568，註78)。在此思路下，作者指出毛澤東決定緩和中共與美國關係的主要考量之一，即是要降低外在威脅的認知，以減少軍隊在國內的政治份量(頁320)。這是一般外交史著作在分析當時毛採行石破天驚的外交戰略調整時，較少提及的中共內部因素。另外，作者也對林彪與陳伯達的政治合作，在「狼狽為奸」的傳統看法外，提出另一種解釋，亦即林需要陳在意識形態上合理化其將來主政後「以軍領黨」的統治實質(頁300-301)。

二 多層次、多面向的介紹

在中共「政治掛帥」，尤其是北京「中南海」牽動政局發展之下，文革期間的「高層政治」，自然作為本書的主要部分。在此一層次的探討裏，除了前述高層精英在文革中的意向與作為，作者也突出中文文革相關著作較少涉足的體制制度與組織發展的問題。包括：毛澤東認為對之綁手綁腳、欲去之而後快的黨機器——文革前後中央「五大部」的介紹；黨政部門在運動中的遭遇；



文革期間浩浩蕩蕩的遊行隊伍

文革期間叱咤一時的「中央文革小組」與令人畏懼的「中央專案調查組」的演變、內部運作，以及此兩者之間的唱和關係。

然而，本書既以整個文革為主題，並以較寬廣的學術社群和一般讀者作為閱讀對象（頁x），其對文革探討的面向也盡可能地伸展，亦即力求「廣而全」，使之既非同於僅鎖定高層人事傾軋的傳統文革著作，也與馬若德自身先前獨立著作的聚焦視野有所不同。

例如「中層政治」，也就是地方文革，在本書中亦佔有一定的篇幅。對於發生於地方，但引起中央注意並影響其判斷、進而驅動整個文革運動進程的事態，如上海「一月風暴」和「武漢事件」，作者就闢有專章對其始末作細節的說明和分析。另外，對於文革「運動中的運動」，如「清查五一六」、「清理階級隊伍」等在地方上的表現、發展及影響也有介紹。作者一再指出相關群眾運動造成擴大化的內在邏輯：各級領導為了向上表現革命熱情，也藉機把「雞毛當令箭」，剪除同級與治下的異己（頁371），致使運動猶如脫韁野馬，一放不可收拾。

除了關注文革本身在不同層次的發展外，本書也旁及文革期間中國的經濟、社會情況。例如：在文革氛圍下出現對毛膜拜的光怪陸離現象（頁262-68）；在推行「一打三反」時，暴露出無產階級工人生活內容的貧乏（頁305）；黨官僚先受衝擊、重組後再忙於內鬥，卻意外地給長年被糧食徵購制逼迫的農民，帶來難得的喘息機會（頁271-72）。

三 平衡處理爭議性問題

對於文革期間發生的一些事件與問題，作者平衡地同時陳列處於對立立場的說辭，或是將既有的不同研究觀點，共載而不論。就前者而言，例如：文革初進駐校園的工作組自身和對之不滿的批評者，都有機會在本書中獲得發言的席位。本書在記述上海「一月風暴」時，同時並陳新官上任者與黯然下台者的感受。另外，對於發生在西寧的解放軍與紅衛兵血腥衝突的「青海日報」事件，作者也蒐羅各方對該事件的不同敘述版本，試圖更全面地恢復其原貌；也將之視為一個奪權風潮下，地方軍隊與造反組織難以共存的典型案例（頁179-80）。

就後者而言，例如：對於一些關於林彪與「九一三事件」的研究尚未有共識的問題，如林彪是否參與中共後來宣稱破獲的林立果陰謀刺毛計劃或僅是靜待命運的安排；林彪對於1971年9月12日當晚發生的事情是否完全清楚的問題，作者坦言仍屬未知（頁335-36）。毛澤東為何在1973年同意對周恩來展開批判一事，作者也以開放性的疑問句方式，共舉兩項可能：一是以馬若德自己當時比較中共政要言論內容所發現的殊異，顯示毛當時對美態度可能出現變化；二是前中共官方研究周恩來的學者高文謙所指的大出外交風頭的周恩來冒犯毛所致（頁365）。由於本書以整個文革作研究主題，無法也無須對於若干仍未水落石出的歷史公案提供直截了當的「說法」。這是既能體現現有

對於文革期間發生的一些事件與問題，作者平衡地同時陳列處於對立立場的說辭，或是將既有的不同研究觀點共載而不論。這是既能體現現有相關研究成果、也是較為保險的方法。

由於中共黨史研究在書面資料取得方面的限制與困難，訪談成為一項特殊性質的補充。然而，作者也有不慎之處，如引用一名酒醉公安官員的說法，來說明林彪為批判陸定一所發之申明信的內容，則多少顯得有些畫蛇添足。

相關研究成果、也是較為保險的方法。

但是，作者這種兩面或多面並陳的處理方式，在遇到其他後來也被中共官方視為「絕非善類」的人物時，就比較少套用。例如：對於曾位及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黨內大筆杆子陳伯達，作者就不相信陳會真心主張中共在「九大」後要優先發展生產力。在引述陳所言的「要發展生產，搞好生產，提高勞動生產率」的同時，註明「陳伯達自己所說的未必是他自己所相信的」（頁285-86）。在陳伯達之子努力下付梓的有關陳的「遺稿」和「最後口述回憶」中^③，都極力強調陳對「發展生產」、「新工業革命」、「電子技術」的倡議，但作者並不予理會，即使作者在本書中的其他部分也引用這兩本書。

至於以「左王」著稱的中共華東局、上海市委的一把手柯慶施，是否與文革前江青等在上海秘密撰寫批判吳晗文章一事有關的問題，作者採信相當流行的說法，亦即認為當柯聞知江青此舉乃獲得毛澤東的許可，便義無反顧地指派其麾下的兩名宣傳家張春橋、姚文元協助江，並指出這是柯對毛「最後一次具有政治意義的行動」（頁15-16）。針對此一問題出現的為柯澄清、「平反」的文章^④，不曉作者是否知情？若知道，不知又將如何處理？

四 豐沛、多元的歷史材料

本書採用的豐富資料，亦是其一大特點。作者為了搜集資料，可說是「上窮碧落下黃泉」，沈邁克甚

至走訪中國大陸郊區的跳蚤市場。作者也確實掌握不少獨家資料，包括私人日記與口供紀錄。這些材料有助於讀者了解當時普通人的心理狀態，以及文革中一些大張旗鼓的政治捕殺（如「清查五一六」）本身的荒謬性。

書中也多處引用中國大陸以外人士的觀察與感受，使得讀者有機會看到在文革演變的當下，世人對中國急遽變化的一手反應。例如：瑞典駐中國的使館人員傳回其國的有關中國內部情勢的報告（這或與沈邁克為瑞典學者有關）。值得一提的是，作者特別稱許前國民黨要員陳立夫對中共鼓動學生造反的做法的批評和預測，認為欺騙、利用年輕人，終究會被後者所反對（頁151）。

作者進行訪談的所得，也作為本書的資料來源之一。作者的訪談對象甚多，可見其所下的功夫，包括：歷史當事人（如王力、聶元梓、與姚文元接觸過的美國前左派人士）、中國大陸學者（如王年一、蘇紹智），以及一些匿名的資訊提供者（如參與調查劉少奇、宣稱周恩來批示「此人該殺」的將軍之子；目睹鄧小平在1973年參與對周恩來批判的前中共外交人員；知悉毛澤東給華國鋒一些手書紙條內幕的中共前外長喬冠華的親近同僚；親身參與1975年鎮壓雲南種族問題行動的民兵）。由於中共黨史研究在書面資料取得方面的限制與困難，訪談成為一項特殊性質的補充，若能適當運用，確可收出之有據、言之有本之效，本書即因此增色不少。然而，作者也有不慎之處，例如：引

用一名酒醉公安官員的說法，來說明林彪為批判陸定一所發之申明信的內容(頁35)，則多少顯得有些畫蛇添足。

此外，作者在文革後期旅居中國的經歷和聽聞，也記述於書中。例如：文革時擔任英國國會議員的馬若德，在訪問中國期間與中共外交部官員談話中，獲知對方對中國自身政治形勢的看法(頁582，註21)；「第一次天安門事件」前後，馬若德行經北京、上海時的見聞(頁432-33、600，註50)；沈邁克當時就讀於上海復旦大學，其當年記下張貼於校園內的「批水滸」大字報內容(頁402、596，註32)，以及其中國室友聽聞到周恩來逝世廣播的反應(頁415、598，註9)，都成為本書的資料來源。

五 商榷與評論

本書內文超過四百頁，百密不免一疏，存有一些立論值得商榷或說明、推論不足之處。以下列舉數項：

第一、作者對於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未能有力預防文革發生，頗有責難。作者認為：毛澤東與林彪聯手倒羅瑞卿時，大家縱有保留，但卻任之而去，喪失了最後一次聯手限制毛的機會(頁26)。另外，作者在評價周恩來時也提出一個相似的問題：如果周恩來在文革初始時，憑藉其在黨軍中的巨大威望召集同僚制止文革的話，對中國是否會更好(頁416)？事實上，作者對他們錯寄厚望，因為

他們不是錯失了及早補救的良機，而是根本早就自斷了亡羊補牢的可能性。

這些文革以前處在第一線的領導人，對毛澤東一再退讓與姑息，主動挺身攬責、為之開脫，甘於與毛為伍，混淆了毛個人與黨的最高利益，讓毛的威望在其鑄下諸重大錯誤後，不降反升，進而愈益巍然難動。時至作者曾予寄盼的文革前哨戰——反「彭羅陸楊」，一旦毛擺出態度，劉、鄧、周即以言行支持毛，淪為其打手，替毛的階級鬥爭險峻的敵情判斷作背書、加註腳，縱使開刀對象是自己的左臂右膀也在所不惜。因此，當毛將打擊目標轉向他們，後者惟有俯首稱降。易言之，作者與其指責他們預防文革不力，不如說他們一貫對毛遷就的做法，促成一不受牽制、得以率性發動文革的毛澤東。

第二、本書對於文革期間中共各種形式會議的召開及其組成，多有所著墨。例如：中共領導中樞裏國務院與「中央文革小組」合開的所謂「碰頭會」，以及文革中召開的「九大」、「十大」兩次黨全國代表大會。然而，在論及「九大」時，卻出現一個論點上的問題。1969年中共「九大」黨章有別於1956年中共「八大」黨章，如同1945年中共「七大」黨章再次載入「毛澤東思想」，將其與馬列思想重新並列。作者在接受有關毛澤東認可1956年做法的可能性的同時，又矛盾地斷定「九大」黨章在此點上的變化，反映出毛澤東對先前相關字眼的刪除有所不悅，對當時支持此一決定的人懷有憎怨(頁292)。這忽略毛本人與中共中

作者對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未能有力預防文革發生頗有責難。但事實上，作者對他們錯寄厚望，因為他們不是錯失了及早補救的良機，而是根本早就自斷了亡羊補牢的可能性。

作者只注意到文革中對各級黨幹部的羞辱，重挫了百姓眼裏中共的權威性，以及毛主席者敢想、敢說、敢做之核心信念的傳承，卻忽略了中共官方為穩固其統治，反過來有意識地操作文革議題並汲取文革經驗的能力。

央因時空變遷在認識上或已有所不同。

事實上，1956年黨章有意不提「毛澤東思想」，乃出於包括毛在內的中共高層的共識，譬如：必須照應國際影響，特別是蘇共「去史達林化」衍生的反對個人崇拜的情況。無關乎誰意圖貶抑毛以及毛對誰懷恨在心的問題^⑤。相形之下，在1969年的中國，以對抗國內、外「修正主義」為職志的文革，至此時宣告取得「偉大的勝利」，指導文革前進的「毛澤東思想」，在「九大」黨章上明載其指導性的地位，自然是順理成章。

第三、作者在解釋毛澤東何以在1970年代上半期讓鄧小平再次出山時，着意強調的重要因素之一，是毛希望能藉鄧小平縮減軍隊對各級政治的介入，並對之進行整頓。作者認為軍方會收縮觸角、接受批評，是因為毛起用同屬「長征」老兵的鄧，可以誘導將領們認為老資格的鄧將作為周恩來的後繼者，而為他們不喜的文革新貴就無法得逞（頁379）。

除了此一誘因外，作者沒有足夠注意的是，毛請鄧小平這個「軍師」出山所具之對軍方加壓的意味。在講究論資排輩的政治文化中（軍系更是濃烈），鄧不但有戰功，在中共坐江山後也曾代表黨出面壓制軍隊（例如以黨總書記身份在1958年召集元帥會議、驅策軍隊開展「反教條主義」運動）^⑥。易言之，鄧本身所具坐鎮督軍的威勢與能耐，是毛向軍首施壓、促使軍方願意在文革期間所得利益上退讓的另一關鍵因素。否則，毛為何不乾脆早命周做

此事？或者要敬陪元帥末座、據聞正是軍區司令對調構想的建議者葉劍英單獨負責呢？

第四、鄧小平在「文革歲月」的表現，在本書中可以看到一政治人物為保住最後一絲的生存餘地，所表現出的靈敏政治嗅覺與謙卑低下姿態，例如：迥異於劉少奇，鄧俯首認錯，表示要洗心革面；對於林彪的如日中天的政治現實，致信表態頌揚。鄧如此方能躲過劉少奇慘死的結局，更能在出乎意料的情況下東山再起。然而，相較於鄧屈居下風時的「軟的更軟」，作者對於鄧小平後來在堅持治理整頓作法、拒為文革評功擺好上表現的「硬的更硬」，除平鋪直敘地記錄相關過程外，卻無予以充分的解釋。

第五、作者有時或「嫉惡如仇」，在解讀「激進派」的政治意圖時，顯得過於粗糙，僅以「隻言片語」就將之「定性」。以江青為例，1969年討論林彪作為毛澤東繼承人的地位是否應列入黨章一事時，除了林彪本人持保留意見外，其他高層人士皆表贊成。江青為此解釋：把林副主席的名字寫入黨章可減少其他人覬覦這個職位的可能性。作者即表示江青此言不小心地洩露了她本人會因此項條款而感到損失的想法（頁291）。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Richard M. Nixon）訪問中國大陸期間，江青邀請尼氏欣賞革命樣板戲時向之表示：「你為何之前不來中國？」作者推測江青此言真正的含意是「你為何現在來中國？」並認為據此即足以顯現江青對中美關係突破不利其在封閉國度恣意追求自我政策的反感（頁348）。以上兩處，

作者在推論時會否稍嫌急促，讓讀者無法一下子跟上？

最後，相較於書中對文革始末所作的地毯式掃瞄，作者對於文革影響的描述，則顯得過於簡約，甚至在看法上失之片面。作者在視文革為中共統治的一道分水嶺時，只注意到文革中對各級黨幹部的羞辱，重挫了百姓眼裏中共的權威性，以及毛主義者(Maoists)敢想、敢說、敢做之核心信念的傳承，讓現今人民勇於對官員的貪腐表達不滿。作者卻忽略了中共官方為穩固其統治，反過來有意識地操作文革議題並汲取文革經驗的能力，例如：透過其主導的傳媒不厭其煩地反覆強調文革的教訓就是國不能亂、黨的領導不能廢，以至中共的地位不容動搖；以文革為反例，宣稱政治多元主義有導致政治失控的風險，甚至成為中共在政治民主進程上怠惰、不思突破的理由；鑒於文革中因社會存在的張力所引發的破壞性能量，讓中共更小心地在社會各群體中加以分化拉打，就算不能根絕社會怨懟的根源，目前也尚能將之化大為小、分而抑之^⑦。

作者在視文革為當代中國史的一道分水嶺時，認為文革的慘痛教訓以及之前大躍進的悲慘結果，乃是中共最後一次追求獨特中國道路、維護中國本質的嘗試。它的失敗所產生的「物極必反」的效應，就是促使中共重拾中國自十九世紀中葉以來持續不斷尋求富強的目標，而其採取的「改革開放」政策，無異是投入西方式現代化的懷抱。作者這一隱含西方中心主義立場的非此即彼的論斷，是否足以概括中國文

革後經右政左的發展途徑與過程，以及充斥「老大難」問題的中共迄今仍能「逆勢而行」的現象，恐怕皆不無疑義。

註釋

①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修訂本，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頁609。

② Roderick MacFarquhar,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People, 1956-1957*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4);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Great Leap Forward, 1958-196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Coming of the Cataclysm, 1961-1966*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③ 陳伯達著，陳曉農編註：《陳伯達遺稿——獄中自述及其他》（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0）；陳曉農編纂：《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香港：陽光環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

④ 鄧偉志：〈如何評價柯慶施〉，《黨史縱覽》，2003年第9期，頁36-43。

⑤ 沈志華：〈中共八大為甚麼不提「毛澤東思想」〉，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網站，www.usc.cuhk.edu.hk/wkgb.asp。

⑥ 鍾延麟：〈1958年鄧小平在解放軍「反教條主義」運動中之角色與活動〉，《中國大陸研究》，2006年第4期，頁77-103。

⑦ Elizabeth J. Perry, "Studying Chinese Politics: Farewell to Revolution?", *The China Journal*, no. 57 (January 2007): 1-22.

鍾延麟 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